

曾召南  
石衍丰 编著

道  
教  
基  
础  
知  
识

西華書社

# 道教基础知识

曾召南 石衍丰 编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8年·成都

责任编辑 陈建明

封面设计 黄 薇

## 道 教 基 础 知 识

曾召南 石衍丰 编著

\*

\*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都一中印刷厂印刷

\*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1.66印张 27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614—0105—1/B·6 定价：2.40元

## 序　　言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18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曾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历史上，它与儒、释一起，均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它长期积累的经籍书文，包含着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化学等方面丰富的资料，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道教，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不少国内、外学者即开始注意对中国道教的研究，近几年来更成为许多国家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解放前国内学者对此研究较少，解放后起步又较晚，因而研究成果相对说来并不多，系统介绍中国道教基本知识的通俗小册子，也很缺乏。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基础知识》的出版，当有其积极的意义。

该书既名曰《道教基础知识》，就表明其主旨在于介绍道教的ABC。共分八章，分别介绍了道教的起源和形成、道派、人物、经籍、方术、神仙、名山宫观、道教与儒释的关系等。在编写中，作者尽量注意了科学性和知识性的结合，

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并力争在介绍基本知识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创新。如在道派一章中，除对主要道派作了必要介绍之外，又对过去很少专题研究的元代龙虎宗支派——玄教作了介绍；在经籍一章中，对“三洞”的来历，作了一些新的有益的考证；在名山宫观一章中，除了介绍道教主要的名山和宫观之外，对宫观的起源、衍变及其建筑的沿革等也作了较详的说明；对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史，本书也列为专章作了较为系统的叙述。所有这些，都可看出，本书既是初学者了解道教的入门读物，也对道教研究者有一定裨益，适应面较广。该书在文字表述上尽量注意了语言的通俗化，凡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同志均可读懂，不失为一本介绍道教基础知识的良好通俗读物。

当然，由于道教内容的杂而多端，涉及的文化知识面很广，过去的研究基础也不够，因而缺点和错误还是难以避免的，希望广大读者随时给以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使它进一步完善。我想，这也是作者和读者的共同期望吧！

呻希泰

1987年12月19日

# 目 录

<b>序 言</b> .....	( 1 )
<b>第一章 道教的起源与形成</b> .....	( 1 )
一 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	( 1 )
二 道教的前身一方仙道和黄老道.....	( 23 )
三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	( 33 )
<b>第二章 道教教派</b> .....	( 38 )
一 由五斗米道、天师道到龙虎宗.....	( 38 )
二 由上清派到茅山宗.....	( 47 )
三 由灵宝派到阁皂宗.....	( 50 )
四 楼观派的兴衰.....	( 53 )
五 金初出现的北方新道派.....	( 57 )
六 宋元南方诸道派.....	( 73 )
七 玄教和正一道.....	( 87 )
<b>第三章 道教人物</b> .....	( 94 )
一 汉魏两晋南北朝道士.....	( 94 )
二 隋唐五代道士.....	( 103 )
三 宋辽金元道士.....	( 109 )
四 明清民国道士.....	( 123 )
<b>第四章 道教经籍</b> .....	( 128 )
一 道教经典的起源和形成.....	( 128 )
二 道教经典的分类及其经目.....	( 132 )
三 历代《道藏》的编纂.....	( 148 )
四 道教主要经书介绍.....	( 157 )

<b>第五章 道教方术</b>	(185)
一 守一、行气、导引、房中	(186)
二 符箓、斋醮	(194)
三 外丹、服食	(198)
四 内丹	(207)
<b>第六章 道教的神与仙</b>	(212)
一 道教诸神的渊源概说	(213)
二 道教神系的形成与发展	(219)
三 神仙及其由来	(230)
四 道教诸神与仙真	(237)
<b>第七章 道教仙境与宫观</b>	(258)
一 道教仙境及道教名山	(258)
二 道教宫观	(279)
<b>第八章 道教与儒、释的关系</b>	(310)
一 汉魏两晋时期	(311)
二 南北朝时期	(326)
三 隋唐五代时期	(337)
四 宋元时期	(343)
五 明清时期	(356)
<b>后 记</b>	(364)

# 第一章 道教的起源与形成

道教产生于东汉顺、桓之际，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为其基本标志。但是，它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它产生的客观条件和内在依据；同时，它的产生又不是突然的，而有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孕育过程。因此本章将分析以下三个问题：一、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以探讨道教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二、道教的前身方仙道和黄老道，以探讨道教酝酿形成过程。三、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以说明道教产生的标志。

## 一 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

道教产生于东汉顺、桓之际，并不是偶然的。以下几点，是促成它产生的主要因素：

### （一）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

#### （1）社会矛盾的激化

东汉顺、桓之际，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从政治上说，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争夺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政治腐朽黑暗。整个东汉王朝，只有开始的光武帝、明帝和章帝三代，皇权尚较巩固，从和帝开始，政权就操在外戚、宦官两大集团手中。因为从和帝起，继位的皇帝都十分年幼（如和帝十岁即位，安帝十三岁即位），需要由

母后临朝。母后为了行使政权，又需依靠娘家的父兄子侄，从而大量引进提拔外戚，使他们攫取朝廷的高官显职，形成把持朝政的强大的外戚集团。皇帝长大以后，势必和外戚集团发生尖锐的矛盾，于是就依靠他最亲近的家奴——宦官发动政变，诛灭外戚。待政权一转到宦官手中，又会组成一个包括宦官亲属故旧在内的宦官集团。这个皇帝死了以后，又是另一个母后代小皇帝掌权，组成又一个外戚集团垄断朝政。如此恶性循环，政权就像走马灯式的在这两个集团手中转来转去，皇帝反而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这样你争我夺的结果，使东汉后期的政治愈来愈腐朽、黑暗。从经济方面说，主要特点是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之风愈演愈烈，农民的土地问题愈趋严重。本来刘秀的东汉政权就是靠南阳和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集团支持建立起来的，因而从东汉初年起，豪强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就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如光武帝的大将吴汉每次出征，其“妻子在后买田业”（《后汉书·吴汉传》）。章帝时，济南安王刘康多殖财货，有私田800顷，奴婢至1400人。到了东汉后期，在外戚、宦官两大集团激烈争夺政权的过程中，掠夺农民土地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如桓帝的外戚大将军梁冀夫妇，公然将“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后汉书·梁冀传》），方圆千里的地区，充作自己的林苑。宦官侯览在家乡山阳郡附近抢夺了良田一百八十顷。其他有田百顷、数百顷的世家大族和工商地主，所在皆有。如经学世家郑兴、郑众父子，传到郑众曾孙郑泰时，有田四百顷。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在以上这种政治、经济形势下，东汉后期政治愈来愈紊乱，经济危机愈来愈严重。而这些社会灾难，都直接落在广

大农民的头上，他们在赋税、徭役奇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的重压下，被迫丧失土地。农民没有了土地，一部份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成为他们的佃户和雇佣，过着十分低下的贫困生活；而更多的农民在丧失土地以后，则变成无衣无食，辗转道路的流民，生活尤为悲惨。加上连年的天灾（水、旱、虫、蝗、风、雹等），使更多的农民饥寒而死。如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郡国遭受蝗灾，河水泛滥，流民达数十万户。许多郡县的道路上到处可以看到饿殍，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可见那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

“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正是造成人民深重苦难的那个社会，给宗教提供了产生和生存的土壤。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渴望摆脱苦难，但又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就常常幻想一种宗教来拯救自己，或者希望借助一种宗教来安慰自己；另一方面，统治阶级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极力希望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以消弭随时可能发生的反抗斗争，并希望利用宗教寻求延年益寿之方，使自己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样，宗教的产生就成了现实社会的需要。可见道教在顺、桓时的产生并非偶然。

## （2）统治思想的宗教化

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成为它统治人民的主要思想工具。汉代如此，以后历代王朝也如此。但汉代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已经不再是孔丘儒学的原样，而是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儒学了。因为他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起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

心的神学体系。他把天打扮成为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成为人格化了的上帝。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四季的更替，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都是由天的意志决定的。他认为天的这种意志，主要是通过帝王、即天之子来体现，帝王受命于天，承天的意志实行统治。当天子的行为体现了天意，天就降吉祥，表示嘉奖；违反了天的意志，天就降灾祸，如日蚀、星变、山崩、地陷等加以“谴责”；如果“尚不知变”，就要受惩罚。这就是董仲舒主张的“天人感应”学说。他就是以这些神学谬论，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理论根据。不仅如此，他还步巫师、方士的后尘，制造了求雨止雨，登坛作法的仪式，他所作的《春秋繁露》中专有求雨篇。以后的大儒刘歆也仿效董仲舒“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见严可均辑桓谭《新论·杂事》篇）。这些都可看出，董仲舒以后的儒学，已经开始走上宗教化的道路。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到两汉之际，主要是东汉以后，今文经学又与谶纬神学相结合，许多经学大师用谶纬迷信来解释儒家经典，使儒经几乎成了神书，孔子几乎成了神人，儒学的宗教化更加严重了。这种历史背景，显然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 （3）佛教的刺激作用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过去比较通行的一种说法是，汉明帝感梦（梦见神人，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来殿前），遣使向西域求法，从此佛教传入中国。即是说，佛教的传入在东汉明帝时。以后一些学者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时限太晚了，应该在它之前的西汉末年，或者说在两汉之际，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不管明帝时也好，或两汉之际

也好，下距顺、桓道教产生，至少已经有几十年或近百年的  
时间了。在这段时期中，一些外国僧人以他们特殊的方式在  
中国进行宗教活动，如实行斋戒，礼拜释迦。这些就必然给  
当时的方士以很大的启示，促使他们利用中国古代的宗教信  
仰和思想资料去创造中国的宗教。可以说，佛教的传入对中  
国道教的产生起了催生婆的作用。

## （二）道教产生的思想渊源

以上说的是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即促成道教产生的外  
在因素。另一方面，道教的产生，还须依靠自身内部条件的  
积累，这是道教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些条件又不是凭空  
产生的，而都来源于中国固有的文化渊海中。下面叙述道教  
的思想渊源。

宋元之际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说：  
“道家之术，杂而多端。”应该说，道教不仅在方术上杂而  
多端，思想来源也是杂而多端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  
流传已广的思想和信仰都有长期的延续性，道家和道教都善  
于兼采各家思想以为已有，因而造成杂而多端的情况。正是  
这些杂而多端的思想和信仰，经过长期酝酿发展，才逐渐滋  
生出思想比较驳杂的道教来。

### （1）巫术

巫是古代交通鬼神的人。《说文》曰：“巫，祝也，能  
斋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段玉裁不同意把巫  
解释为祝，认为巫与祝的职掌不同，祝是在祭祀时“主赞词者”，  
即用言词来交通神的；而巫则是用歌舞来降神悦神的。  
但后代许多书上都是巫祝连称，因他们虽有小异，但大的方面是相同的。  
在殷周时，巫祝的社会地位很高，可和史

官并列，是朝廷两个重要官职。那时国王无论处理大小国事，都要通过巫进行卜筮，以求得神的启示，最后决定作与不作。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处在巫术的支配之下。随着奴隶制的灭亡，也是随着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巫的地位和作用逐步下降。大概到汉代以后，明文规定巫医不能作官，巫医的地位更一落千丈。但是任何一种在社会上产生过影响的思想和信仰，都不会突然地消失，而将适应新的形势，经过改头换面，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巫术也这样，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一直流行着。桓谭《新论》说：“昔楚灵王骄逸轻下，信巫祝之道，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国王鼓舞自若”（转引自《太平御览》卷735）。楚灵王当春秋末年，可知春秋时流行巫术。从中还可看到女巫降神的某些仪式，如讴歌起舞，用歌舞形式请神（与祝赞词略有不同），即女巫和着鼓声的节拍边歌边舞，手中还要执羽绂（似用羽毛和丝带扎成的舞具）。新中国成立前，还有巫婆装神弄鬼，他们搞降神，俗称跳神，所谓“跳”大概就是从过去的“舞”来的，或跳即是舞。《诗经》中还写了巫的舞态，其《陈风·宛丘》写道：“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翫。”表明巫舞中确是要击鼓的。以后到战国，屈原在《九歌》中，更生动的描写了女巫降神的场面。如《东皇太一》：“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唱。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王逸注：芭，巫所持香草名），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

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按王逸注说，以上文中“灵”是楚国对巫的称呼。从上引各节可知巫皆少年美貌之女子，她们在歌舞前梳妆打扮，穿好看的衣服，手中要持香草；有人给她们伴奏，除击鼓外，还有竽瑟等乐器，她们就是按音乐节奏拍起舞的。有学者认为《九歌》是夏朝流传下来的祭神歌，只是经过屈原加工改造而成。若此，它反映的巫舞，时代当更早。

以后到秦汉，巫风仍然流行，各种史书上都有记载，只是内容、形式有所变化发展了。除继续使用击鼓、歌舞降神，给人祈福、禳灾、治病外，还搞一些符篆、禁咒和幻术。用符篆厌鬼，禁咒劾鬼。幻术如《抱朴子》上所说造雾、禁水等。甚至还搞一些害人的勾当，如作木偶人象某人，而针刺，箭射之，冀使某人得病，俗称巫蛊。武帝时还为此兴过大狱（见《汉书·江充传》、《戾太子传》）。

《文物》1981年第3期发表了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一文，其中讲到近代从地下发掘中获到了30多件巫师为死者“解适”的实物，包括陶瓶、泥封、木简等，上面书写了巫师作法事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东汉后期巫师活动的记载。所谓“解适”的“适”通“谪”，指罪过、责罚的意思，“解适”即解除死者的罪过和责罚。大约认为死者生前有罪，安葬时又触犯了神灵，需要请巫师作法事为它解除罪责。所以待巫师作了法事，把用过的那些道具陶瓶、泥封等，连同上面的文字，留在墓室里，这才使我们今天能看到它的大致内容。怎样为死者“解适”呢？一般都是假借天帝的名义，下一道命令给地下官吏，免除死者的罪责。有时是天帝直接下命令给地下官吏，这种情况较少，多

数是通过天帝使者直接下命令。天帝使者的名字叫“黄神越章”。这种命令文书后面，常仿照汉代官府文书，有“如律令”字样，并加盖天帝使者黄神越章印，或在文末加印，或在封泥上加印，以昭郑重。据说即使不要文书，只要盖上这个印，就有驱鬼镇邪的作用。除黄神越章印外，这些镇墓文中，有的还画有符篆。《贞堂松集古遗文》卷15即收有桓帝永嘉元年一篇镇墓文件中的符篆，其它地区也有类似发现，证明符篆的出现最迟不会晚于桓帝元嘉元年。此外，镇墓文中还常见管鬼魂的“泰山君”的名字，称“生属长安，死属太山”。东汉的都城在洛阳，不在长安，东汉墓中的“生属长安”，是沿袭西汉的说法，证明泰山君管鬼魂的说法，至少在西汉就产生了。

通过以上发掘出的镇墓文的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方面了解东汉时巫术活动的情况，而且还可以看出道教吸取巫术的情形。北周释道安的《二教论》列出“三张之鬼法”十一事，以攻讦道教，其中就有“墓门解除”一条，说“左道余气，墓门解除”。大概三张时期，道士活动中，尚承袭有巫术墓门解除的内容。十一条中又有攻击道士使用黄神越章一条，说“或轻作凶佞，造黄神越章，用持杀鬼”，这些指责，可能并非虚语。至于以三张为代表的道教符篆派，常以咒语、符篆请神役鬼，不仅当时如此，以后也继续使用并有发展，成为这派道士的基本特征。泰山神也如此。以后历代王朝崇信泰山神，道教也一直崇拜它，称为东岳大帝，这些都可看出道教方术中保存了不少巫术。当然这些巫术已经和殷周时的原始巫术有很大不同，而是经过许多演变以后到东汉时期的巫术了。道教所继承的就是东汉时期的这

种巫术。

## (2) 神仙思想和方术

神仙家出于春秋战国，大约开始是由燕齐沿海地区的方士们搞起来的。他们或者看到古代一些人经过某些健身术的锻炼获得了长寿，便以为人可以长生不死；或因为海市蜃楼等奇异现象，误以为海中住有长生不死的神仙，并猜想他们一定吃了某种奇药，才会不死。开始这些思想信仰只能是很零碎的和原始的，到战国中期，邹衍创造了阴阳五行学说，“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史记·封禅书》），方士们见此说有用，就援引它作为自己神仙说的理论，使之和神仙方术结合起来，从此神仙思想和方术就大大流行起来。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我们了解到那时的神仙方士们还编著了不少书籍，有《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等。这些书可能大都为先秦人所作，目前已经全部不传了。虽然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们自己所作的书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不能从这些书中直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方术，但与它们同一时代的一些古籍还保留了一些记载，使我们可间接窥知他们的内容。其中以《庄子》的记载最多。《庄子》各篇并非全出庄子之手，内容中又多寓言，但是我们相信它所描写的神仙及其方术，实际是来源于当时的神仙家。该书很多篇中都对神仙（它称神人、至人、真人）的面貌、生活、本领和修炼方术作了描写。如《内篇·逍遥游》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同篇又说：列子能御风而行，旬有五日而后反。《内篇·齐物论》

中又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内篇·大宗师》又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从这些描述中，不仅使我们看到了神仙家想象中的神仙是什么样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死生无变于已，平时乘云，驾龙，骑日月，周游四海），而且还使我们知道神仙家所主张的辟谷，行气等方术。《刻意》篇中还专门对行气、导引作了记载，说“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除《庄子》外，屈原《楚辞》还对神仙游历太空作过十分动人的文学描写。并记有赤松、王乔、韩众等仙人名字，说“闻赤松之清尘”，“羡韩众之得一”等。《战国策·楚策》和《韩非子·说林》中还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据《战国策·楚策》，荆王即顷襄王）的记载。《山海经》中又记有不死国、不死民、不死山、不死树、不死药，以及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归藏》中还有“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的记载，等等。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战国时期的神仙思想是很流行的。降至秦、汉，这种神仙及其方术，又因秦始皇和汉武帝大规模的求索，而盛行不衰（这点下面还要叙述）。所以，酝酿孕育于战国、秦、汉，最后产生于汉末的道教，自然要以它们作为一种思想资料而加以吸收。于是长生不死，成了道教的基本信仰，神仙方术成为道教的基本道术，只是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不断地补充。而且相比之下，这种神仙思想和方术，在道教全部思想来源中所占的比重是很